

【理论研究】

“空间转向”之后的欧美女性文学批评

刘 英

【摘要】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空间转向”席卷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发。在空间视阈的观照下,女性文学研究聚焦分析三种空间:城市空间、风景空间和流动空间,不仅揭示性别空间的建构本质,展示空间对性别生产的影响,而且强调“空间实践”的意义,提出空间是多重的、动态的、异质的及情境性的空间,空间的意义可以由行动者在空间中的实践所塑造。女性文学研究一方面从“空间转向”中获得深刻启发,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回馈、反哺和充实了“空间转向”,实现和见证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价值。

【关键词】空间转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城市空间;风景;流动空间

【作者简介】刘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2.3.189~19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号16ZDA197)的阶段性成果。

空间对于女性写作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1929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房间》开篇就直指这一问题:“我站在图书馆门口,推门欲入时,却见一位守门卫士挡住我的去路,图书馆不允许女士入内,除非有研究员陪同或出示介绍信”。^①伍尔夫以牛津大学图书馆为例揭示:20世纪之前,学术和知识的公共空间一直将写作女性和女性写作拒之门外,为女性走向文学创作设置了重重关卡。由此,伍尔夫提出空间对于女性创作的重要意义,开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性别空间的关注和挑战。

尽管自伍尔夫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常常使用空间隐喻,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觉地从空间视角进行分析,发生在“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之后。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空间转向”席卷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发。在空间视阈的观照下,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就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地理空间的建构与女性身份的建构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文学对空间的表征

如何影响性别身份的建构?女性文学怎样参与空间生产?虽然已有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依然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是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从“空间转向”中所获得的深刻启发,疏于系统梳理和整体观照;其二是对于文学地理和空间研究前沿动态,及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启发未做及时跟踪和思考,其三是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空间研究的跨学科价值缺少深度总结。鉴于此,本文试图勾勒“空间转向”之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全貌,并将“流动性转向”等空间研究新范式纳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聚焦三种空间:城市空间、风景空间和流动空间,认为空间是充满权力关系的系统,深刻影响着性别身份的生产 and 性别关系的建构,展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文化地理的学科对话。

一、女性与城市空间

19世纪以前,城市是男性主导的空间。城市由男性设计、规划和建造,也被男性所主宰。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极大改变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此

前,女性受家庭空间和关系束缚。现在,城市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汹涌如潮的人群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吸引力以及匿名掩盖下的新自由”。^②随着消费文化在城市兴起,“市中心商业区”(downtown)成为女性聚集的场所。文学批评领域重要学者丽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在讨论现代性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百货公司作为一种新型城市空间在19世纪中期的出现,打破和重塑了私人/公共的性别空间对立”。^③百货公司既以其温馨舒适的购物环境成为家庭私人空间的延展,又以集购物和社交为一体的公共空间使女性走出家庭空间束缚,使女性成为现代性的主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左拉的小说《妇女天堂》(*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乔治·吉辛的小说《古怪女人》(*The Odd Women*, 1893)、德莱塞的小说《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 1900)、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House of Mirth*, 1905)等。

以左拉的小说《妇女天堂》为例,其标题“妇女天堂”意指百货公司是独具女性特色的公共空间,为中产阶级女性提供了享乐、挥霍和幻想的天堂。在这里,摆脱了家庭束缚的女性幻化为购物女神,穿梭于各式各样的商品间,在把玩、选择和购买商品的过程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力感和主宰感。“妇女天堂”的乐趣不仅限于购物,还提供阅览室、茶室等半封闭空间供女性朋友聚会聊天,这种介于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第三空间”有助于促进女性之间的交流,增强女性群体意识。另外,“百货公司成为女性凝视的对象,为女性释放被压抑的欲望提供了通道”。^④同时,丽塔·菲尔斯基提出辩证看待百货公司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虽然百货公司为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提供了合法性,但女性在百货公司所体验到的杀伐决断、挥洒自如的权威感实际上是一种幻象,这一切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精确算计。百货公司的空间设计、布局和设备处处都是资本的精心策划,旨在刺激女性消费,获得更多利润。

20世纪之前,关于女性与城市空间的讨论大多被男性作家主导,但随着女性城市文学崛起,女性不

再局限于以消费者身份出现在购物中心,而是主动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英国作家伍尔夫和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前者以书写伦敦著称,后者以纽约叙事闻名。如果说“写作行为本身就相当于绘制地图”,^⑤那么,伍尔夫和华顿不仅通过文学写作绘制了伦敦和纽约地图,创造了“真实和想象的空间”,^⑥而且通过其笔下女性人物深入城市肌理,展示“城市作为物质和象征实体如何反映性别、阶级和空间的交织”。^⑦在伍尔夫的笔下,伦敦是一个对新女性开放的创造性空间,在这里,性别秩序虽未被完全重构,但至少被悬置,孕育着新的生机。尽管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牛津大学图书馆将女性拒之门外,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却为女性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女性自由进入浏览、阅读和研究。伍尔夫的作品中不乏图书馆意象,常常以“图书馆圆顶象征双性同体的头脑,以阅览室座位象征知识公地”,^⑧大英博物馆对于知识女性来说,发挥着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功能,是城市空间为知识女性提供的一块飞地。

如果说伍尔夫绘制了伦敦城市地图,伊迪丝·华顿则参与了纽约的城市空间生产。华顿不仅在早期小说和游记中对性别与建成空间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而且在其建筑美学著作中为空间创新提出富有价值的设计理念。华顿作为文学家的更大贡献,则体现在她所绘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城市女性生存地图。华顿的纽约小说横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描绘了女性在城市的不同命运轨迹。在其代表作《欢乐之家》中,女主人公莉莉·巴特因家道没落尝试通过婚姻进入上流社会,与名流新贵交往失败后跌入社会底层。伴随着社会地位的浮沉,是地理空间地位的走低,她一路从纽约第五大道、麦迪逊广场等华丽豪宅滑落到阴冷潮湿的廉价旅馆、单身公寓、工人宿舍和简陋厂房。如果说百货公司和沙龙为中产阶级女性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么,大多数美国女性是以劳动者和生产者的身份进入城市空间的,美国城市空间的女性化表现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到1890年时,将

近20%的美国女性就业。^⑨

女性的城市漂流和城市漫游曾引起社会的普遍焦虑,在19世纪男性作家笔下,街道漫游女性基本是负面形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围绕“都市漫游”(flaneur)展开热烈讨论。“都市漫游者”源自本雅明讨论法国作家波德莱尔笔下19世纪巴黎的都市漫游现象。作为新型城市空间的观察者和现代主义艺术家的隐喻,“都市漫游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男性,而女性仅仅是被他们凝视的风景之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此提出质疑。雷切尔·鲍尔比撰文《步行、女性与写作:作为漫游者的伍尔夫》(*Walking, Women and Writing: Virginia Woolf as Flaneuse*)展示女性作家的都市漫游如何为其文学创作提供灵感。黛博拉·帕森斯的《漫步城市街道:女性、城市与现代性》(*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Women, the City, and Modernity*)考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女性城市文学,展示这一时期女性记者和作家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察者。如果说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与城市保持着疏离,那么女性漫游者则带着新鲜的目光走进并打量城市,深入城市内部展开参与式观察。“女性作为观察者进入城市街道,并将女性对城市空间的体验转化为叙事形式,对原来独属于男性的城市审美感知发起挑战”。^⑩

总体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女性与城市空间的讨论集中在两点:一是女性与现代性空间,二是女性与都市漫游,聚焦的时间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因为这一时期既是城市现代化巨变期,也正值“新女性”和各阶层女性集中涌入城市公共空间,改变了城市空间的性别属性。21世纪以来,女性与城市空间的故事在书写进行时,也将持续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关注。

二、女性与风景空间

温迪·J·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中指出:“从历史来看,风景曾长期以来是男性的领域。早期欧洲壮游(Grand Tour)沿途欣赏风景的是男性,早期风景画资助人和生产者都是男性,风景美学理论家是男性,最早推动风景旅游业的也是男性”。^⑪

可见,不但作为视觉主体的女性在风景之外,而且女性时常被物化为风景成为观看的对象。风景的性别问题虽然十分突出,却长期被忽视,原因是风景一直被置于“视觉”范畴当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空间转向”使风景研究从“视觉”转向“视觉性”(visuality),将视觉看成是以不同方式建构的产物,“如果视觉指人眼能看到什么,视觉性则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⑫因而,风景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观看方式”。风景背后的权力关系一旦被展露,风景也随之被纳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视界。

风景的性别二元对立始于18世纪风景美学中的崇高和优美概念。埃德蒙·伯克的《关于崇高与优美概念之起源的哲学考察》和康德的《论优美感与崇高感》对崇高和优美进行了如下区分:崇高象征理性、巨大与敬畏,而优美则代表舒适、愉悦与和顺。“康德提出的崇高是一种超验自我,超然于身体、情感及传统上与女性气质相关的一切领域”,^⑬可见,崇高和优美具有明显的性别属性,分别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关联。

18世纪的英国男性诗人和文学家将登高“远眺”“俯瞰”和审美距离作为必要前提,认为“远眺”和“俯瞰”让观者获得开阔视野,提升思想高度,跳出具体,把握全局,从而写出伟大文学作品。但在18世纪的英国,“远眺视角后面隐藏的是一种特权”,^⑭远眺和全局把控意味着首先要拥有风景所属权。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在论18世纪风景和男性气质的关系时指出,“宏观、抽象视角属于精英贵族男性,他的悠闲生活方式和他对土地的超然态度,与农民、手艺人、商人注重细节的锱铢必较形成鲜明反差”。^⑮崇高美学对理性和宏观的张扬,对具体和细节的贬抑,在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评论康德的理性批判时被重点讨论,“在纯粹理性运作时,我们将具体性置于普遍原则之下;在实践理性中,我们将具体性置于普遍准则之下”。^⑯然而,在18世纪的英国,只有位高权重的男性才拥有土地和风景所属权,只有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才得到更多训练从具体中抽象出普遍性的能力。

崇高和优美美学概念内在的性别内涵,非但没有让女性作家沉默,反倒促使她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声音。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简·奥斯汀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女性作家面对风景美学的文化压力,勇于挑战性别标签,努力摆脱男权美学思想左右,巧妙利用“如画”(Picturesque)风景,书写女性文学风景。如画是对崇高的补充和纠偏,崇高强调理性、抽象和宏观,如画侧重感觉、微观和具体。正如戴维斯(Hugh Sykes Davies)指出,“如画风景基本是细节的和变换多样的”。^①“如画”是对之前标准化视觉性的重组,“如画介于崇高的悲剧性与优美的喜剧性之间,是两者的融合”。^②如画不强调远眺和俯瞰,而着重低位取景,这与女性作家置身于风景之中与风景互动的方式正好契合。简·奥斯汀从青年时代起就倾心于“如画”美学,并且在《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等小说中加以运用,在这些小说中“如画”风景比比皆是。^③与崇高美学不同,女性作家通过对如画风景的表征,将宏观与微观、具体与普遍、神圣与日常风景相融合,达成对崇高和优美的杂糅,成就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特有的文学风景。

除了以“如画”书写女性文学风景之外,女性文学还通过“花园”风景倡导女性主义理念。花园风景大量出现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女性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根据《女性、文学与驯化的风景》一书观点,花园这种所谓的“驯化的风景”是这一时期女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协商的关键场所。^④花园通常被认为是封闭空间,是女性逃离外部世界的世外桃源。但在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花园”既是闲暇娱乐和园艺劳作的场所,也是概念和象征的空间,是女性作家参与关于性别与阶级辩论的媒介和武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著名的《女性权力辩护》(1792)开篇就以“花园”为喻,揭露女性被培养的方式就如同花园里过分施肥培育出的鲜花,只有柔弱之美,缺乏内在力量。女性作家对以卢梭的《关于植物学的要素:致女士的一封信》(1796年

译为英文)为代表的男性植物学思想提出质疑,重申女性不是供人欣赏的鲜花或花园,而是参与种植过程的园丁。多罗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和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等女性作家不仅撰写园艺手册、参与花园设计,而且在小说中用花园展示人物性格和作为社会阶级的标记。可以说,花园为女性作家在家庭空间和更广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同时女性也发挥能动性,将花园打造成激发女性创造力、促进女性参与知识建构的场所。

如果说英国女性作家利用“如画”风景和“花园”改写了风景性别和性别风景,那么,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美国女性则在西部拓荒过程中参与了西部风景的生产。西部拓荒以其对土地的征服、对土著居民的征服、对未知疆界的征服等征服主题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的故事,大部分西部小说歌颂的是白人男性在蛮荒土地上的刚健和英勇。但事实上,西部风景中同样闪耀着女性身影。维拉·凯瑟的《啊,拓荒者!》(1913)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玛丽·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1903)等西部女性文学以女性视角见证并记录了西部拓荒史,撰写了有别于冒险、暴力等男性拓荒主题的拓荒叙事。

《美国西部女性作家:1833-1927》认为西部独特的风景、历史以及气候环境造就了不同于波士顿和纽约等东海岸女性的西部女性,“西部以其开阔无比的空间,摆脱传统的自由、阶级差异的缺席、对个体能力的肯定等因素,更易于使女性成为自由独立、身强体壮的女性。”^⑤在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拓荒者是西部农场和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西部的发展又使西部女性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敏捷的思维、更多的社会参与感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另外,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对于西部风景生产也有独特的贡献,甚至女作家、女画家及女摄影师在西部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西部风景的改变。“在西部逗留或安居下来的女性,将西部广袤的空间看成潜在的花园,而不是欲以征服的荒野。她们通过想象花园、建造花园,将这片新土地打造成家园”。^⑥西部女性文学经典《啊,

拓荒者!》和《少雨的土地》等通过彰显生态主义风景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书写了别样的西部风景,参与了西部空间的生产。

三、女性与流动空间

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及信息流动的逐渐增强,跨界和流动成为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新生关键词。研究者在对既有空间划分进行反思时,发现被严重忽视的空间形态,即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阈限”的词源是拉丁文 *limes*,意为门槛或交界,指时间和空间上的过渡状态。“阈限”空间包括火车、汽车及旅馆等在公共、私人空间之间的物理空间,公路、车站及机场等临时的过渡空间,也包括现实与虚拟交错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因其主要特征是流动性(mobility)和阈限性(liminality),也可称其为流动空间。如果说21世纪之前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焦点是检视公共、私人空间的性别划分,那么,21世纪之后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则转向了流动空间及其文学表征。该转向的大背景是空间研究发生的“流动性转向”(the Mobility Turn),^②也源于文学批评学科内在的跨界动力,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对性别领域划分话语的超越。此三种因素合力促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吸收借鉴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等提出的流动性和阈限性相关理论,积极探讨女性在流动空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流动性在形塑女性新型身份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火车作为19世纪出现的新型流动空间,吸引了维多利亚时期众多作家的目光。19世纪英国日报和月报上发表的数以百计的小说常常以火车作为爱情故事、侦探故事、超自然故事及恐怖故事的发生场景,见证了火车对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魅力和影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以火车探讨新型空间给女性带来的机会和风险。“火车车厢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既有家庭空间的安全,又有公共空间的风险,是恐惧的空间也是舒适的空间,是盘问的空间也是交谈的空间,是飞驰的空间也是静止的空

间”。^③陌生男女在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空间共同吃饭、交谈和休息,引起社会的普遍担忧。正如比利(Sabin Bieri)和热罗德蒂(Natalia Gerodetti)指出,“19世纪旅行民主化导致流动性增强,火车车厢作为一种新型空间,可能造成社会秩序被挑战,因而需要监管和规制”。^④因此,19世纪男性作家的小说通常渲染女性在火车上如何陷入危险境地,女性面对强盗和凶手如何束手无策等,目的多是为维护既有性别秩序。可以说,这些作品一方面的确反映了女性在车厢空间可能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掩盖了火车旅行给女性带来的机会和能动性。但同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火车故事却常将女性乘火车旅行作为女性在阈限空间的实践,并以其喻指女性对性别规范边界的跨越。如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小说《婚礼旅行的故事》(*A Story of a Wedding Tour*, 1898)将火车空间描述为帮助女性逃离压抑婚姻,走向自由人生的途径。

火车流动性在女性自我实现过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美国女性流动性叙事中得以彰显。以维拉·凯瑟(Willa Cather)、伊迪丝·华顿为代表的美国女作家展现女性借助火车为休闲、旅游、求学、工作、考察及创作等的城乡流动和全球流动。如小说《云雀之歌》(*Song of Lark*, 1915)探讨了女性借助火车实现空间移动从而完成阶级跨越的主题。女主人公西娅(Thea)从科罗拉多州月亮石小镇走出,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在大城市实现了美国梦,并走向世界舞台。西娅的地理移动促成其社会流动性的提升,像云雀一样,西娅乘着火车一路向前,从乡村走向城市、走向全球,成为现代新女性的典范。在此过程中,火车是重要的流动媒介。

与火车流动空间不同,汽车不仅是一所移动“住房”,将原本私密、固定和静止的家庭空间嫁接到了开放、流动的公路空间,使“公共”与“私人”空间相互交织,而且汽车(auto-mobile)本身就兼具自主性和流动性,将身体与技术融合,弱化生理性别差异。长期以来,驾车狂飙被认为是彰显男性气质的标志,公路

小说被认为是男性专属文类,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女性作家纷纷加入公路旅行叙事,代表作有芭芭拉·金索芙(Barbara Kingsolver)的《豆树青青》(*The Bean Trees*, 1988)、希尔玛·沃利兹(Hilma Wolitzer)的《心》(*Hearts*, 1980)和切尔西·卡因(Chelsea Cain)的《达摩女孩:一次美国跨代的公路旅行》(*Dharma Girl: A Road Trip across the American Generations*, 1996)。在女性公路小说中,驾车上路为女性提供了在身体空间、家庭空间、地方空间以及国家空间之间跨空间尺度的流动空间,封闭促进了女性之间的交流,驰骋释放了女性的能量,移动开阔了女性的视野,旅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火车和汽车是在公共/私人空间之间的阈限空间,赛博空间则是现实与虚拟交错的阈限空间和流动空间。赛博空间是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其小说《神经漫游者》(1984)中创造的词汇,意指网络用户“共同达成的幻象”。^⑤但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赛博空间的意义已经远超吉布森当初的预想,呈现出阈限性和流空间(space of flows)功能。阈限性表现在匿名、过渡、性别差异最小化及身份自由切换,而流空间作为信息技术社会的新型空间,表现在“社会实践的共时性不依靠物理临近,而是通过网络达成”,^⑥并将性别、知识、地位和信息等全都纳入到流动的轨道。在女性科幻小说家笔下,赛博空间有时是女性越界的浪漫之地,有时是永恒记录女性经验的重要媒介。如在梅丽莎·斯科特的小说《特拉伯尔和她的朋友们》(*Scott, Melissa. Trouble and Her Friends, New York: Tor Books, 1994*)中,赛博空间成为现实世界的无名小卒亦可纵横捭阖的理想圣地。在弗莱彻的小说《硅语》^⑦中,爱丽丝的一生经历被制作成电脑游戏置于互联网中,被永久记录。综合看来,赛博空间对女性主要有两方面影响:其一是赛博空间的在线身份具有虚拟性,为女性提供了匿名性,让性别身份模糊,甚至可以自由流动,消解性别对立,使女性可以冲破现实世界的束缚,获得新的经验和主体意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资源,按照自己意愿进

行文学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是赛博空间并不是女性乌托邦,作为现实与虚拟的间性空间,赛博空间虽然为女性创造新的身份提供了可能,但仍无法让女性完全摆脱现实世界的影响,甚至网络身份会夸大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强化性别对立。

火车、汽车及赛博空间都是一种阈限空间和流动空间,也是德塞托所说的“日常实践空间”,^⑧既是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相遇的物理空间,也是被不断赋予意义、产生意义的象征空间。文学对流动空间的表征既可以维护性别空间秩序,也可以对其发起挑战。

结语

回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空间研究的发展轨迹,从对空间散见的、自发的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空间转向”之后,系统地自觉地对空间的探讨,“空间”概念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检视性别建构提供了理论框架。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主动借鉴文化地理理论,积极吸纳风景和景观研究、边界和跨界研究、情感地理、数字地图、流动性研究等理论资源,在文化地理、文学研究及性别研究之间建立学科对话。随着对女性与空间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入,“空间转向”40年后的今天,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不再一味揭露性别空间的建构本质,或者批判空间秩序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而是超越“怀疑阐释学”,走向“后批判”(post-critical)阅读。在拉图尔(Bruno Latour)“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影响下而开启的“后批判”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探索空间的能动性,强调“空间实践”,通过在空间中行动而改变空间。无论是家庭空间还是公共空间,乡村空间还是城市空间,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或者上述空间的各种交叉组合,都是多重的、动态的、异质的及情境性的空间,都意味着空间的性别意义可以由行动者在空间中的实践所塑造,这不仅成为21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新焦点,也构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对空间研究的新贡献。总之,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一方面从“空间转向”中获得深刻启发,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其自身发

展过程中也回馈、反哺和充实了“空间转向”,拓展和深化了空间和性别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实现和见证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价值。始终秉持着学术开放的态度和不懈探索前沿的精神,时刻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女性与空间互动形式,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依然“在路上”。

注释:

① Woolf, V., *A Room of One's Own*. Richmond: Hogarth Press, 1929, p.9.

② Ryan, M. *Women in Public: Between Banners and Ballots, 1825-188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63.

③ Felski, R.,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

④ Bowlby, R.,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New York: Methuen, 1985. Friedberg, A., "Les Flâneurs du Mal(l): Cinema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MLA*, 106(1991), p.420.

⑤ Tally, R. T. Jr., *Spati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80.

⑥ 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⑦ Squier, S. M., *Virginia Woolf and London: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C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11.

⑧ Bernstein, S. D., *Roomscape: Women Writers in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George Eliot to Virginia Woolf*.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57.

⑨ Hapke, L., *Tales of Working Women: Wage Earning Wome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90-1925*. New York: Twayne Press, 1992, pp.1-2.

⑩ Bowlby, R., "Walking, Women, and Writing: Virginia Woolf as Flâneuse", *Tropismes*, NO.5(1991), pp.207-232.

⑪ Darby, J. W.,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Bloomsbury Academic, 2000, p.2.

⑫ Foster, H.,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 WA: Bay Press, 1988, p.ix.

⑬ Mellor, A. K., *Romanticism and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88.

⑭ Barrell, J., *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30-80: An Equal, Wide Survey*.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1983, pp.17-50.

⑮ Barrell, J., *Poetry, Language and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0.

⑯ Eagleton, T.,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0, p.85.

⑰ Davies, H. S., *Wordsworth and the Worth of Wo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9.

⑱ Price, M., "The Picturesque Moment", *From Sensibility to Romanticism: Essays Presented to Frederick A. Pottle*, eds. Frederick Whiley Hilles and Harold Blo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77.

⑲ 何畅:《风景的阶级编码:奥斯汀与如画美学》,《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36-47页。

⑳ Bowman, A. S., Pepper, J. W.,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 Domesticated Landsca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㉑ Nina, B., *Women Writers of the American West, 1833-192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p.9.

㉒ Stout, J. P., *Picturing a Different West: Vision, Illustra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Cather and Austin*.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5.

㉓ Urry, J., *Mobil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㉔ Despotopoulou, A., "Running on lines: Women and the Railway in Victorian and Early Modernist Culture", *Women in Transit through Literary Liminal Spaces*, eds. Teresa Gómez Reus and Terry Giffor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48.

㉕ Bieri, S., Gerodetti, N., "Falling Women - Saving Angels: Spaces of Contested Mobi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ies with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rain Station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8(2007), p.222.

㉖ William, G.,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Books, 1984, p.51.

㉗ Castells, M., "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 *Urban Geography* 20(1999), pp.294-302.

㉘ Fletcher, B. J., *The Silicon Tongue*. Spinifex Press, 1996.

㉙ Certeau, M.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117.